

信義書房漫話之三

海內外的中文圖書館

吳相湘

圖書館是人類貯積知識的寶庫，也是人類汲取知識的泉源。它的重要性，自古已然，於今爲甚。

五十年來，我曾訪問過海內外自由國家的許多著名中文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網羅全球各種書刊，參考閱讀非常便利；我國立北平圖書館度藏國學典籍豐富，館舍環境尤極優美，是我最喜愛嚮往的。至於北大母校圖書館及臺北中央圖書館在國難中埋頭擴建，更給予我永遠難忘的印象。而多年經驗的累積，使我深刻體認：熟習「書目」實在是進入圖書館的先決條件。沒有鑰匙，如何能打開寶庫呢？

民國十二年春，我在湖南長沙儲英源住所設立「家庭圖書館」，是這五十年來我對圖書館發生濃厚興趣的開始。

私家藏書和公共圖書館的任務作用完全不同，這是現代人熟知的常識。但在半世紀以前還在小學讀書的我却並不了解這些道理。現在我也回憶不起來當時是什麼動機促使我在楚怡小學圖書室以外「獨樹一幟」？但清清楚楚的記得：當我表現出這一「衝動」後，裏成大嫂曾經爲我在刻字舖雕刻一橫長約一寸橢圓形圖章，「家庭

圖書館」五個字分作上下兩排，外圍是小三角花邊，應用紅色印泥鈴蓋在約一千餘冊兒童讀物扉頁。每天放學後，許多同班友都三五成羣來我家借書，我和相埒弟都忙着取書收書。至於如何分類插架，已經記不得了。當時藏書絕大多數是商務、中華各書局的出版物。沒有連環圖畫一類——文獻記載：一九〇八年上海文益書局刊行的連環圖畫三國誌，是最早的連環畫；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才有「跨海征東」連環畫的繼起，是有光紙印行。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連環畫改為白報紙。都祇有十張薄薄的一本，比較商務中華出版品的彩色精印，大不相同，自然引不起我們的興趣。

自民國十六年秋，我進入湖南明德中學，圖書室收藏書刊一萬餘冊；加以課餘假日，相濡五哥又常帶我們到省教育會後坪右側「省立中山圖書館」去看書或借書。心胸眼界都擴大，家庭圖書館從此停止活動，個人對圖書館才有認識。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秋，我北上入學，看到北京大學外表純樸內容豐富的圖書館，尤其融會中西文化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我發現天外有天，對圖書館的興趣也更進一步。

北大圖書館在國難中建新廈

早在一九〇二年，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在義和拳亂以後復興時，就利用馬神廟四公主府（即北大第二院）後院設置藏書樓，調取江浙鄂粵贛湘等省官書局刻印名書，並採購中西各書店新舊圖書插架。翌年，巴陵方大登先生將家藏書籍捐贈。日本阪谷男爵及我駐日駐俄使館也先後捐贈中西書籍。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的「圖書館」，因此逐漸奠立基礎，並且成為這七十年來國內公私立圖書館的先導。

司馬遷史記記載：老子是周代「守藏之史」。可見早在三代時就已注意圖書的收藏。三代以下，漢朝尤注重圖書館。宋朝印刷術發展，公私藏書風氣更盛。祇是這些藏書處所大多是宮庭、官署、寺院、學校及私人欣

賞之用，極少公開給真正喜愛讀書的人閱覽。清乾隆末（西曆一七九〇年）在鎮江、揚州、杭州建立文宗、文匯、文瀾三閣供江南士子閱讀四庫全書，也祇是局部開放。後來這三閣都不幸燬於太平軍戰火（文瀾閣部份倖免）。一直等到一百年後即光緒末（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時才有人「請依乾隆故事，更加推廣，自京師至十八行省省會咸設大書樓」。宣統元年（一九〇八年）學部正式制訂京師及各省圖書館章程。從此，「藏書樓」成為歷史名詞，圖書館在各地先後設立，而全國首創的北大圖書館却因國內政局擾亂，僑促於四公主府後院近三十年。民國二十年蔣夢麟先生就任北大校長，才新購松公府舊址稍加修理，改作圖書館——但這不過是一舊式四合院平房，距離現代圖書館藏書安全閱覽便利的標準實在太遠。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北大圖書館新廈在松公府西院空地開始建築。不到一年時光，這一座可容五百人閱讀的新圖書館正式開放。每一「北大」都感覺歡喜和驕傲：（一）這是中國近代首先設立的國立大學，經過了三十七年，第一次建設一座現代化的圖書館。（二）經過長久內亂外患，毫無建設以後，這座圖書館居然在中日塘沽協定後十一個月，日軍向平津步步進逼時動工。建築費大部份是北大歷年經費的節餘存款以及留校服務的畢業同學捐款。顯示強寇壓境之際，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為民前鋒」表現固守國土的堅強意志。（三）這圖書館收藏中文書十七萬餘冊、西文書六萬七千餘冊、日文書一萬二千餘冊、中外文雜誌四百餘種，居全國大學圖書館藏書首席，而文科研究所收藏清內閣大庫檔案及漢代木簡，更是其他公私立大學圖書館所無。如今新廈落成，閱覽參考比較以前都便利了。因此，自這一工程開始，我們每天從西齋宿舍到舊圖書館或文學院上課經過工地時，大家都再三徘徊，看到鋼筋的樹立、水泥拌沙石的灌注，每個人都更堅定多難興邦的信心與決心。圖書館新廈正式開放以後，新地質館、新學生宿舍也先後接近完成階段。不料竟引起日本人的妒忌：日本人使用各種方法腐蝕中國人心，策動「內變」，以便不戰而得華北。如今北京大學竟努力建設中國文化的精神堡壘，日本人竟認為是在進行大規模反日宣傳。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憲兵二人就直入北大校長室，「邀約」蔣夢麟校長到日本使館武官室，並要蔣將往「滿州國」向關東軍說明。同時，日本憲兵也曾經到胡適院長家

「邀約」。因胡適外出，未果。

這件事的傳聞，加上日本軍用飛機在北平上空的時時出現、日本浪人的橫行無忌，使我們意味時局日見嚴重，在「最後一課」來臨以前，必須充分把握時間和讀書機會。圖書館新厦更是我每日必到的處所——我讀過一些什麼書，留待以下各篇記述，這裏只說一件難得的「小事」：

民國二十四年春，馬隅卿（廉）教授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時病逝在教室。他老生前購藏中國人情小說（即今人所謂黃色小說，如金瓶梅、肉蒲團等），和上海周越然收藏西文人情小說，南北對峙，著名於世。北大圖書館在馬氏逝世後收購其藏書，編目後規定四年級及研究生可申請閱讀。民國二十六年五月，我完成畢業論文，等待繕寫正副本時，幸獲閱覽這些藏書的機會。這在嚴重的時局中可說是難得的輕鬆。二三十年來，我曾向若干研究小說的學人如故夏濟安兄等炫耀這一「黃色」經驗。

對日抗戰勝利以後，我兩次到北平，多次過訪北大母校。圖書館藏書更增加，著名的李木齋（盛鐸）家藏珍本也被北大收購插架於善本書庫。胡適之先生戰時在美國收藏的官私出版品也陳列其間。研究民族優良文化，輸入外國新知學理，原是胡先生多年以來對國立大學重要性的基本認識，如今擔任北大校長自然更加積極推動起來了。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北大圖書館舉行「北京大學五十周年展覽會」預展，我看到「校史及已故教師遺著展覽」：自民國五年蔡元培先生長校以至勝利復員的各時期文獻。「圖書展覽」有宋元明清刻本及鈔校本五百種、馬廉遺書小說戲劇八十種、水經注宋刻本及永樂大典寫本等。內容豐富的珍本，實在是五十年來所僅見。翌日我即離北平南下，但北大母校圖書館却給予我永難忘懷的深刻印象。同樣的：我對於融會中西文化——尤其中美合作的一具體象徵——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舉世無匹的優雅館舍與富藏迄今仍歷歷如在眼前。

國立北平圖書館是中美文化合作的象徵

國立北平圖書館位於北平北海右側，占地近八十畝，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六月落成。是薈萃我國京師圖書館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北京圖書館所有藏書而成。

京師圖書館是宣統元年（一九〇八年）清廷詔令設立，以熱河文津閣四庫全書及翰林院國子監南學與內閣大庫殘本為基礎，又先後調取各省書局刊刻官書。各省督撫也採進若干私家名藏，甘肅藩司且採進敦煌唐人寫經八千餘件，尤見珍貴。民國成立後，北京政府教育部又將前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等撥交。因此，這一圖書館成立之初收藏國學典籍即相當豐富。尤其內閣大庫殘本，更值得注意。

中國歷代宮庭都有一可觀的書藏。黃巢及安祿山之亂，使唐朝以前的儲藏沒有遺留下來。宋朝偃武修文，印刷術發展，三館藏書最多。女真、蒙古先後崛起，宋朝藏書不被焚燬即被掠奪北運至大都（即北平）。明太祖滅元，收大都圖書運南京。於是文淵閣典藏宋金元三朝宮庭所儲而滙於一。明成祖建都北京後又將文淵閣圖書文獻北運——明代文淵閣原是內閣辦事處所，與清朝文淵閣只是儲藏四庫全書性質完全不同。滿清入主中原，明文淵閣儲藏很自然地歸入清代內閣大庫，但已有散失了。宣統元年設立京師圖書館，將這內閣大庫殘本撥交收藏。其實這「殘本」仍包括宋元祕籍六百種之多，其中有宋代玉牒（帝王族譜）、宋鈔本仙源類譜、宋刻本歐陽文忠公集、文苑英華等，都是宋代原裝。這是很顯明的說：中國歷代僅存的國有圖書遺產歸屬了京師圖書館。另一方面說：這京師圖書館也顯出是宋代以來一線相承的國立圖書館的不尋常性質。

京師圖書館既具有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象徵，而北京圖書館更表現中美文化合作，也就是中國接受美國人力財力以及美國方法來管理圖書館的事實。早在一九〇〇年美國韋棣華女士（Mary E. Wood）在中國，發現圖書館的缺乏，是中國學校不能發展教育無法普及的原因。最初她在武昌文華大學內先試辦一小型公共圖書館。再經過海內外一番奔走，募集經費，一九一〇年，文華公書林正式在文華大學成立。因為她意願成為公共

圖書館，故稱爲公書林，以示不是文華大學所私有。但嚴格地說：這不過是一所大學圖書館對外界的公開，並不是一所公共圖書館的產生——韋棣華女士又再接再厲地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在文華大學創設圖書館科，爲中國培植現代化的圖書館人員，這是近五十年來海內外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與管理人員的最早來源。其中有幾位先進，我曾拜見過。（文華大學附近一小食品店出售「文華餅」，我曾和當時女友現在的夫人同往嗜食，使我對於中國圖書館現代化的搖籃所在地還留下甜蜜回憶）。從此美國方法——圖書必須分類，目錄必用卡片，開始在中國生根萌芽。如今美國各圖書館華籍職員衆多，中國人學習能力，真是驚人。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正當我國內若干大學圖書館先後設立時，韋棣華女士又回美國，要求華府將退回中國的第二批庚子賠款作教育文化用途，並聘請圖書館專家鮑士華博士（Dr. Arthur E. Bostwick）東來調查中國圖書館事業狀況，以便對庚款用途提出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鮑士華博士來到中國。後來他根據調查所得，建議以庚款一部份在中國大城市次第設立大規模的圖書館。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一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因決定將協助京師圖書館計劃，改爲獨立經營一北京圖書館。三月，勘定北海附近館址後即向海內外徵求建築圖樣。丹麥人莫律蘭工程師（U. Leth. Moller）膺首選，受聘爲建築師，協和醫院建築師安那（C. W. Anner）爲名譽顧問。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一日舉行奠基禮。當時距北伐軍統一南北將近一年了。六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決議這一圖書館與由京師圖書館改名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合併。民國二十年六月，北海右側新館落成，兩館富藏從此薈萃一處。所有建築費以及合併後經常費與購書費都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撥付。中國第一所現代化公共圖書館的基礎從此奠定。

我北上入學時距離這一新型圖書館的正式開放不過兩年。如上篇（專家前輩發書目興趣）所記述：趙萬里先生在我們一年級講授「中國史料目錄學」，經常帶領我們去參觀。因此，我們多次獲得升堂入室到書庫去的機會。趙先生特別展示文津閣四庫全書若干名著繕寫字跡拙劣。他說明：這比較皇城內文淵閣四庫全書（即今世上流行的四庫影印本底本）字跡工整大不相同；這是因爲文津閣遠在熱河避暑山莊，皇帝不經常去，祇不

過是裝點門面，四庫館臣自然偷工減料了。趙先生又用實物具體說明宋、金、元、明、清代印裝幀的異同——北平圖又經常展示歷代善本書籍。因此，我對版本學也感覺興趣，並且有皮毛見識。

國立北平圖書館能融會中西文化尤其達成中美合作目標，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之諸先生都有貢獻。不幸在新館落成以前，梁先生逝世，他遺囑將所有個人藏書及手稿等都存放在這一圖書館。因此，我在看過宋元刻本以後，再參觀「梁啟超紀念室」，面對中國近代維新運動主角的手跡墨寶，緬懷我華族偉大優良傳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如何「日日新」以適應世界新潮？觸景生情，更加強我對中國近代史的興趣。

「海約翰紀念室」是國立北平圖書室另一具有非常意義的特藏，也開啓我對世局的進一步認識。

海約翰(John Hay)是美國前任國務卿，一八九九年九月，在俄國企圖獨霸中國聲中宣佈「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不祇緩和了當時局勢，並且爲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簽訂「保證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及獨立」的九國公約奠定基礎。從此，中美傳統友誼也更加強。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國際聯合會難以處理，另舉行九國公約會議仍無法制裁侵略者。經歷近四十年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完全被摧毀了。但這將近四十年尤其塘沽協定以後四年寶貴時光，實在是八年抗戰的基礎。探本溯源，「海約翰紀念室」的設立確具歷史意義：由於海約翰的明決宣佈美國堅定支持中國的立場，遠東國際政治鬥爭才見緩和。如上記述：一九〇〇年韋棣華女士東來積極推動中國圖書館現代化，如今這一中美合作的具體象徵——國立北平圖書館在「九一八事變」前五旬正式開放，旋即設立「海約翰紀念室」，自然是顯示中美傳統友誼的重要並加強海氏所謂「世界和平繫於中國」的論點，促起世人注意。

國立北平圖書館新廈與協和醫院，是二十世紀初期故都兩大融會中西的宮殿式新建築。互相比較，前者顯然占了「地利」及「後來居上」的優勢，即位置於故都名勝北海右側，且面對中南海，湖光山色襯托，氣象萬千，加以總面積近八十畝，大廈前一雙華表，再有相當的正廳及書庫面積大小的寬廣草坪，遍種花卉，這和大廈正廳閱覽室的寬敞，同樣表現出泱泱大國之風。這一雄偉開朗美侖美奐的館舍與環境，不祇協和醫院顯得偏

處開區難以相比。近三十年來我遊歷海外自由國家各著名圖書館後更可肯定說：我國立北平圖書館建築與環境的優美實在是舉世無匹。

戰時戰後圖書的聚散與播遷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我目睹日本飛機深入中國內地，轟炸湖南長沙西岸嶽麓山湖南大學圖書館，企圖毀滅中國傳統文物（當時故宮寶藏正寄存於此）。從此，戰區及內地各大學與公共圖書館都分別向鄉村疏散。化整爲零，部份開放閱覽，已是非常難能可貴。「詩書缺，唯口舌」正是形容戰時圖書不易得，師生唯有口耳相傳授。八年戰爭，各級學校教學水準逐年下降，這是主要原因。

民國二十八年夏，我有幸得參觀湖南湘鄉縣鄉間曾國藩故居富厚堂，其中有藏書樓，是戰時非常難得的經驗。這一藏書樓用灰磚建築，通風及光線都很好，除開木質書架及門窗與北平圖書館書庫鋼質書架及門窗不同以外，其他大多相似。可見中國傳統工匠對於藏書樓閣的構造與西方近代建築師的觀念大體相同。曾氏藏書樓收藏清代文集甚多，曾國藩兄弟父子手扎內頁都已他運保存，信封仍在，加以曾紀澤少年時閱讀的英文書籍以及他出使英法的若干照片等也收藏如舊，給予我很大的滿足。二十五年以後，我在臺北終於將曾氏文獻大部影印出版，也可說種因於此行。

抗戰勝利以後，我幸見北平上海各圖書館大體完好，尤其收繳日本居留民的圖書數量衆多——北平地區由國立北平圖書館收繳，全部圖書數十萬冊，利用太廟正殿後殿以及兩廡挿架陳列分類，萬斯年君負責主持，領導我參觀，並告語我：日人自以爲占據華北，可爲子孫萬世計，成千成萬移民自扶桑三島舉家西來定居，攜帶各種圖書文物極多；那裏想到無條件投降！如今經我國完全接收，實在是認識了解日本的重要憑藉。後來我教育部特將各地收繳的日本文及高麗本書籍複本分配給予新設立於西北等地的國立圖書館。民國三十七年春，我

曾在國立蘭州圖書館看到若干自上海北平運來的「收繳書」。

早在北伐完成以前，日本政府即假退還庚子賠款之名肆行對華文化侵略。日支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一九二五年十月）、日本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部（一九二七年六月）先後設立，以為決策施令機構，「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以北平東廠胡同為前進基地，大量購買中國書籍，延聘中國各門專家，開始編輯「續四庫全書」提要工作，更是目無中國「代天行道」——抗戰勝利以後，這一「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接收。我曾有幸參觀這一研究所的圖書館大廈，目睹其藏書以及「續四庫全書提要」打字稿本。（如今這一研究所收藏有關海疆諸書已經中央研究院運來臺灣，「續四庫全書提要」也由商務印書館刊行）。

我基於對近代現代史的興趣，注意有關英日文書刊以外，民國三十六年多，在上海參觀合衆圖書館，印象深刻。這是由戰前著名的人文月刊社、鴻英圖書館以及若干私人藏書合併組成，規模不大，收藏也不甚多；但在國內各圖書館厚古薄今積習下，竟有一所以當代文獻為中心的圖書館，已經是開風氣之先。

民國三十八年春，我渡海來臺灣後，發現省立臺北圖書館收藏中國現代史料甚多。這一圖書館是以前「日本臺灣總督府」圖書為基礎，其中日軍占領廣州後收購的意大利領事藏書——此人最喜收藏中華民國史料，尤見珍貴。同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也有若干中國現代史料。據說是前日本總督一官員自郵局檢查沒收而來。這兩處收藏供應我對現代史若干知識。尤以在省立臺北圖書館發現一八八四年廣州石印刊行的「述報」是人間孤本，記載中法戰爭時中國民氣激昂的真相，為國父自傳得一稀見文證，更感欣幸。

當時，省立臺北圖書館是假新公園內博物館一樓作書庫與閱覽室，自然有些擁擠，但比較植物園內「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簡陋，又不可同日而語。

今日出入中央圖書館的青年讀者，絕不能想像二十年前這一圖書館在現址的簡陋景象：這裏原是日人建築的「建功神社」。我記得：二十年前，中央圖書館展開工作時，即在今日正門兩翼各搭建一鋁質活動房屋作基地，沒有附屬的衛生設備，祇是一如村野的小廁所，曾使當時過訪的外賓驚詫。但蔣復璁館長和全體同仁就在

這樣簡陋環境中努力「化腐朽爲神奇」。神社羅馬式的正廳外表堂皇，但內部木質架構有被白蟻蛀蝕現象。今經過抽換改造已成一宮殿式廳堂。蔣館長是按「一次計劃逐步完成」原則，經過近十年時間、舌焦唇敝，四處求助經費，才集腋成裘完成改造這一舊環境作新用途的初步計劃。尤以正門內大廳前一長方型水池，不祇點綴了景色，並且效法西漢石渠閣積水防火故事，保護藏書的安全。

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物資環境，遠不如國立北平圖書館，但就國學善本書種類數量比較，可說是後來居上。這是蔣復璁館長在抗戰時冒險化名赴上海秘密搜購江南巨室大戶藏書作基礎，加上日本投降後收繳日人及偽組織公私藏書，因之善本書種類數量大大增加。民國三十八年播遷到臺灣。後來北平圖書館在抗戰時寄存美國的善本書也運回臺北。先後開放閱覽，並攝製顯微影片。從此海內外研究中國文化的學人，都可按目錄檢閱自己需要的書籍了。

國立中央圖書館是民國二十二年開始在南京籌設，新館還未及動工建築，對日抗戰發生。四十年來在憂患裏成長，其中有大半艱難歲月是我親身見聞的。

十年以前，國父紀念館建築時，原有將若干空間供中央圖書館應用計劃，後來沒有成議。而陽明山國防研究院撤消，其中原屬「中山文化教育館」及孫科博士個人藏書都撥交國父紀念館，成立孫逸仙博士紀念圖書館。這些藏書很多戰時出版品，是其他圖書館沒有的，如今已在臺北市區公開閱覽。

就我親身經驗：臺北市區現有各圖書館收藏的豐富，不是以前國內任何一大都市所能比擬。對興趣讀書或治學的人說來，自然是空前難得的機會。但究竟有多少人充分把握運用了這一機會呢？

日本、美國、英國的華夏寶藏

滿清末葉，外國人深入我國內地通商或探險，利用中國朝野不注意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弱點，儘力搜購中

國古代器物文獻外運。從此東西各國圖書館都有中國文物的珍藏了。

民國四十八年夏，我訪問日本，特往參觀東京靜嘉堂文庫。因為這一文庫收藏我江南藏書家陸心源皕宋樓全部珍本，是我國宋元刻本書大批被外人收購的一次，因此才刺激國人不再忽視「文化財」，並進而建立圖書館——我在庫長領導下，自紅木書櫥中擇要取閱三數珍本後，就集中時間閱讀「袁氏秘函」，即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前後的手批文件，獲知有關中國現代史的若干知識。

東洋文庫的收藏是以滿州世族譜著名於世，再加清季以來中外各種官私文獻，是日本學人認識中國的重要泉源之一。近二十餘年迎合美國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風氣，更努力搜求資料，擴充研究範圍，且將附設之「近代中國研究會」易名為「二十世紀中國研究會」，頗多出版品，引人注意。歐美研究中國現代史學人也以東洋文庫為一重要中心。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不以宋元稀見刊本炫世，而注重收集一般實用書刊，對中國中古史研究刊有若干專著，並編製唐宋文學家專集引得（索引）。這說明日本各地專門圖書館不祇是收藏書刊，更注意利用收藏書刊作出研究論著行世。並且這些圖書館更能與時俱進，適應時勢需要。例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貝塚茂樹教授原以研究甲骨文為主，近年也撰刊孫中山先生傳。上下古今五千年，自不免淺薄。但比較我國文人學士鑽牛角尖以逃避現實的積習，又不可相提並論——一九六一年秋，我在京都晤見吉川幸次郎教授，他曾在北京大學肄業，以研究元曲知名，對我國青年學人羅錦堂君有關元曲論文很讚賞。

日本東京皇城宮內省圖書寮，是日本皇室圖書館。一九六一年夏，我隨蔣復聰館長前往參觀，發現他們對書籍的珍愛，令人既驚異又慚愧。圖書寮是一木質樓房，底層是如日本榻榻米的接待室，藏書在樓上——我們進入接待室時已照例脫下皮鞋換拖鞋，而樓梯上都滿鋪淺黃緞以防灰塵！我曾在北平故宮文獻館習見清代歷朝實錄每函用黃緞包袱的情景，如今在東京皇城所見却是更上層樓了。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東亞圖書館收藏，以十九世紀末葉書刊為多。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創立

之初，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有關戰爭、革命、和平圖書文獻爲主。第二次大戰後設立東亞部份，注重中國現代史，尤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文獻。三十年來的經營，已形成全球一重鎮，中外研究中國現代史學人幾乎必需一往閱覽，以免孤陋寡聞之譏。這一情勢的形成至少有下述四項因素：①美國基金會的各種資助，購置費充裕。②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將美國科學新書刊與中國大陸交換近七十年來的書刊報紙。③與蘇俄圖書館互相交換，且獲得中國東北西北各省報刊——這些報刊都是毛共不准公開出口，經由蘇俄情報人員秘密外運的。④關係人員私人文件的贈予，其中如我國黃郛、陳誠諸人，美國史迪威、史諾、柯克上將諸人的原始手稿、信件、筆記簿，都是第一手史料。

但世界上絕沒有一所圖書館對於收集圖書是完全無缺的，也就是說各地圖書館都各有短長，學人必須互相配合，才能獲得比較完全的資料。因此，胡佛研究所圖書館雖是研究二十世紀事情的一重鎮，同時，我們却不可忽略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圖書館，更不能不注意華府美國國會圖書館。

哈佛大學總圖書館以外，中日文圖書館是由哈佛燕京社創立與維持。洪煊蓮、裘開明兩先生於此貢獻極大。裘先生獻身圖書館事業已有五十餘年歲月，一九二六年十月即曾以中華圖書館協會代表資格，參加在費城舉行的美洲圖書館協會創立五十周年紀念大會（比較英國圖書館協會的成立早一年）。半世紀來，終日置身書城。去年九月，我訪問哈佛時，裘先生在中日文圖書館善本書庫娓娓與談讀書的甘苦，浩歎「生有涯知無涯」。裘先生並舉例說明：乾隆四十年，陸燿編「皇朝經世文鈔」三十卷，一名「切問齋文鈔」。日本天保甲午歲（西曆一八三〇年）日本翻刻本，咄囉館藏版，共三冊。清同治八年（西曆一八六九年）金陵錢氏重刊本計十六冊。如今日本東洋文庫編印「經世文編索引」竟沒有提到是書。自然是編者不知有是書！日本人以擅長編製工具書（如索引之類）自誇，而人才濟濟的東洋文庫出版品竟如此，其他更不足論。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實在令人警惕。裘先生因此非常感慨：編製一百年來書目或索引，求全求備，已如此不容易，何況當今知識膨脹時代，書刊出版品浩如烟海，選擇、採購、編目更須特別用心。尤其喜捨人牙慧輾轉抄襲的「文鈔公」更

應該審慎，不可以訛傳訛自欺誤人！

哥倫比亞大學在二十世紀初設立丁龍講座，聘請德國華學家夏德教授(Hirth)主講中國歷史文化，始注意搜集中國書刊。經過多年努力，如今收藏已斐然可觀，中國地方志、清代各種則例以及清末民初中國小說尤其特色。大閱覽室左壁一幅胡適之先生青年油畫像，也引人注意。而其總圖書館中重門深鎖收藏的「口述歷史」記錄，如胡適之（包括胡先生日記）、顧維鈞、陳立夫諸先生以及與中國有關的美國人士的親身經歷談。有很多事實是已刊書報所未載或爲人所不知的，將來可供公開閱覽時，一定有新發現。這是有志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人，今後應注意的一新途徑。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近五十年來隨美國國勢而與時俱增。東方部圖書原以中日文爲主，近年韓國出版品也占有一席之地。但這並不是表示所有中日韓文圖書都收藏於東方部。事實上：由於便利檢查參考，這一圖書館分類精細，例如清代「六部則例」、「本朝政治全書」（朱植仁）等都另度藏在遠東法律部。這一圖書館目錄卡片，容易檢尋；東方部及遠東法律部等都有中國籍職員，如有疑問，隨時請教，非常便利。

美國國會圖書館顧名思義，原是供其國會議員職員參考，但自公開供世人閱覽以來，每日出入人數衆多，各種圖書又多是開放式插架，任人取閱。爲防微杜漸，任何人出館時必須接受門警檢查他的手提包——在我經驗中，這是惟一的特殊規定。我曾在北平故宮博物院工作，每日下班時，照例要對出館的職員作一「搜身」的形式，但對一般參觀的人從來沒有任何「不禮貌」。

自一八五二年容閣在耶魯大學畢業，爲中國青年獲得美國大學學位首開紀錄以後，耶魯與中國關係即日趨密切：在湖南長沙設立雅禮大學及湘雅醫學院，更著名於世。自然這一學府也有豐富的中國書籍珍藏。但近二十年來對這些藏書的分類却有一重大改變：一反上述各圖書館將中日文圖書獨立儲藏分類編目的通例，採取中日歐文有關書刊混合統一分類編目的新方式。例如「太平天國」「義和團」關繫中外各國，將所有各種文字出版品盡列一處編目插架，對於某一問題有興趣的學人，無論檢查目錄卡片或到書庫翻閱都可一目瞭然，避免顧

此失彼。這確是一值得注意的新觀念。但要作這樣一項大改變，必需投下很大的人力財力。因此其他圖書館還沒有仿行。

康奈爾大學圖書館東方部，除中日文圖書館以外，注意收集東南亞各國近年公私出版品。在美國捲入越戰前後注意及此，可說是空谷足音。正如哈佛大學一教授所指陳：美國人生命和金錢消耗在越南戰場已是天文學數字了，而美國各大學博士論文以越南為研究對象的，却屈指可數。這一畸形現象的發生，美國各圖書館中缺少越南資料，實在是主要原因。

倫敦大英博物院的圖書室，在十九世紀是世人汲取知識的一重要泉源。馬克斯和孫中山先生等都先後在這裏作座上客。一八九七年初，中山先生進入這圖書室閱讀時的簽名簿，今仍保存。但中山先生當時借閱書籍名目却無法查考了。

一九五九年及一九七三年，我曾兩度訪問倫敦，多次出入大英博物院圖書室。東方部收藏的南洋華僑報紙值得注意。這和新加坡大學中文圖書館儲藏的華僑報紙相互配合，是研究南洋華僑生活以及革命黨和保皇黨活動的不可或缺史料。但有關中國的藏書遠不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質量。

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中文圖書室、牛津大學波德廉圖書館東方部，我也曾於一九五九年前往訪問，其中收藏不能與美國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中日文圖書館相提並論——這正是英國國勢在二十世紀初由盛轉衰的一主要縮影。

三四十年前，我國圖書館事業才開始擴展，不遑刊行目錄或概況。如今這些工作已積極推動，而海外中文圖書館的概況和目錄仍在不斷的編印。有志讀書的人應自這些概況或目錄，認識了解某一圖書館的特色特藏，然後再前往閱覽，自然可事半功倍，不必摸索了。